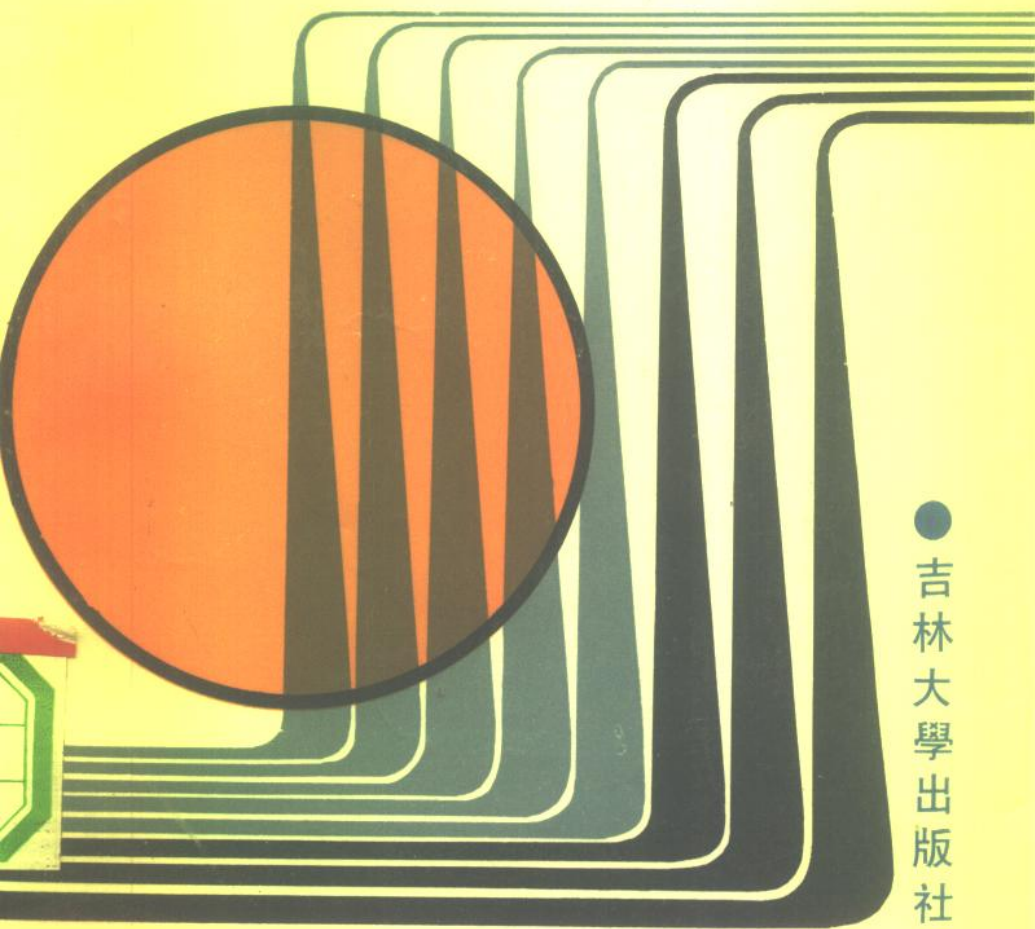


中國統一戰綫 大事記事本末

■ 張鐵男 宋春 朱建華 主編

● 吉林大學出版社



中国统一战线大事纪事本末

主编

张铁男
宋 春
朱建华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统一战线大事纪事本末

主编 张铁男 宋 春 朱建华

责任编辑：刘子贵

封面设计：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长春市东中华路29号)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990年12月第1版

印张：18.125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683千字

印数：1—1 000册

ISBN 7-5601-0693-5/K·21

定价：9.50元

《中国统一战线大事纪事本末》编写组

顾 问	张凤歧	冯锡铭		
主 编	张铁男	宋 春	朱建华	
副主编	刘景富	于文藻	杨海泉	张大庆
	李有清	周兆连	丁文章	
编 委	刘景富	于文藻	杨海泉	张大庆
	李有清	周兆连	丁文章	孙维宁
	张大同	雷家桓	付 光	麻玉林

编写人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文章	于文藻	王人东	王继洲
牛玉峰	傅 光	刘景富	邬雅琴
朱建华	朱兴义	孙维宁	杜 君
张大庆	张大同	陆永山	李东雨
李庆权	李有清	吴长青	吴艳春
宋连胜	杨海泉	周兆连	罗海涛
赵英兰	赵世臣	赵连义	麻玉林
黄凤新	蒋建农	景海涛	雷家桓
简 明			

序 言

中共吉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张铁男、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宋春、吉林大学教授朱建华共同主编的《中国统一战线纪事新编》、《中国统一战线大事纪事本末》两本书问世，令人十分高兴。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一项可喜成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经历了 60 多年战斗历程。在这一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原理创造性地结合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既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理论探索，也进行了极为丰富的伟大实践；既有大量成功的经验，也有遭受挫折和失败的教训。如实地记录和生动地再现这一历史过程，无疑是当前统一战线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推动“一国两制”方针的实施，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爱国统一战线必须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些艰巨的历史任务，爱国统一战线应当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继续发挥法宝作用。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从这一意义上说，总结、研究、回顾统一战线 60 余年的历史，具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编者在这两本书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对统一战线中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以及政治斗争的得失、经验、教训，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并对每个时期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做出正确的评价。两本书自成一体，又互相照应，有叙事体的重大事件由来始末，也有编年体的大事详实记载，可作为了解研究统一战线历史及其经验的重要书籍。两本书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是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良好教材。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中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它为我们进行统一战线科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我们期望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不断探索，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推动统一战线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平杰三

1990 年 5 月

目 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19 年——1949 年)

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3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9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14
李大钊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	18
廖仲恺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24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邓演达	30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从党外联合到党内联合的转变	38
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改组纪实	43
《向导》周刊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47
国共合作与黄埔军官学校	53
国共合作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58
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	63
国共合作与国民会议运动	67
反对西山会议派破坏国共合作的斗争	73
陈独秀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77
蒋介石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述略	83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清党”	88
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分共”纪事	94
土地革命运动与工农联盟	99
中共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兵运工作与宁都起义	109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国统区文化界统一战线	117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123
福建事变中的统一战线工作	128
统一战线性质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33
中国共产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统战活动	140
西北地区统一战线建立述略	149
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	155
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统一战线概述	159

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战线·····	165
一二九运动中统一战线工作纪要·····	174
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华北统一战线·····	180
中国共产党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	186
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和第二次国共合作·····	199
国共合作抗日谈判概述·····	204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纪事·····	211
中间党派与初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19
“三三”制与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政权·····	223
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	229
从政治部第三厅到文化工作委员会·····	236
华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39
王明的右倾错误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44
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48
《新华日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56
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263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的变化·····	270
皖南事变与国共两党政治格局的变化·····	274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与中间势力的联合·····	280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建立始末·····	284
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288
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述略·····	294
中国共产党反对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纪略·····	300
赫尔利来华与国共关系新变化·····	308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314
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和军事谈判·····	320
政治协商会议内外的统一战线活动·····	325
中共代表团在南京的统一战线活动·····	331
中国共产党的白区统战工作与第二条战线·····	336
中国共产党联合民主党派抵制“国民大会”纪略·····	342
国民党最后破坏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动全面内战纪事·····	346
解放区土地改革与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	350
中国民主同盟的新生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	355
解放战争后期共产党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统战工作·····	358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统战工作与上海解放·····	364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	369

国共两党北平和谈始末·····	375
新政协运动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381
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分裂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阴谋的破产·····	386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49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成纪略·····	394
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399
西藏和平解放纪略·····	403
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与统战工作述略·····	406
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412
全国性宗教组织的建立及党的宗教政策·····	415
民族自治区的建立及党的民族政策·····	42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	425
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述略·····	428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国家侨委和侨务工作·····	433
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437
第六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439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及其活动·····	442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445
政权机关、协商机关的统战工作·····	448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与民族工作·····	450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与统一战线受冲击·····	454
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与民主党派内部的“整风”、“交心”运动·····	46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	464
改造战争罪犯纪略·····	468
调整党派关系改进合作共事纪事·····	475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克服国民经济困难斗争概述·····	480
1962年、1964年对统战部的两次错误批判·····	484
李维汉对统一战线的贡献·····	48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	490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述略·····	49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	498
中共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与“一国两制”的形成·····	500
“一国两制”方针与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谈判纪事·····	502
调整对台政策,改善海峡两岸的关系·····	505
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到爱国统一战线的演变·····	508
十六字方针的形成和多党合作的发展·····	515
民主党派、工商联恢复活动纪事·····	518
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与各宗教团体恢复活动·····	52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委员会·····	522
中共中央为全国统战系统平反始末·····	524
民主党派、工商联开展咨询服务、智力支边活动的情况·····	528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从炮制到撤销·····	530
全面落实统一战线政策·····	53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	536
对外开放中的统一战线工作·····	542
小城镇的统战工作·····	546
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549
“三胞”中的统一战线工作·····	552
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会议·····	55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	561
第二次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议·····	563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制定和发表·····	566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19—1949)

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共产国际是1919年3月由列宁首倡创立的,1943年5月宣布解散,共存在24年。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决议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曾得到共产国际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帮助,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尤为突出。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共产国际具体指导下实现的。

共产国际成立不久就陆续派人来中国,其中有的作为苏俄政府外交人员,负有外交使命;有的实地了解中国情况,宣传十月革命。1920年4月,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了解中国国内情况,与中国进步力量建立联系,从事建党活动。维经斯基在北京首先同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建立了联系,并举行多次座谈会,讨论了建党问题,一致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俄共情况,并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条件已经成熟。1920年6—8月,在维经斯基帮助下,上海开始筹建共产党组织。各地也陆续成立共产党小组。1920年7月19日—8月17日,列宁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为大会撰写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作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和其他报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重要思想,指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和方向,制定了共产党人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所应采取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前途等问题,都有重要指导意义。1921年4月,共产国际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来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也派尼科尔斯基来华接替维经斯基工作。从此,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帮助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加速了建党的进程,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确定了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大会没能够提出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政策和策略。

1921年秋,马林在上海会见了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继,商定国民党邀请马林于12月赴广西桂林孙中山总部访问。马林与孙中山讨论了关于苏俄承认孙中山并与其结成联盟的可能性,以及组织群众和在工人中开展宣传的问题。孙中山表示“愿与苏俄建立非官方联系,不再前进一步”。^①会谈中,孙中山还广泛询问了俄国革命、苏俄的发展、新经济政策、苏俄红军的政治训练等问题。马林向孙中山建议:(1)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工群众。(2)创办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3)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孙中山对马林建议建立军官学校,组织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党,

非常赞同。对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代替军事共产主义，至为欣慰。马林广西之行，考察了中国革命形势及各派政治力量，形成了中国革命需要与国民党建立民主统一战线思想，否定了维经斯基依靠吴佩孚发动中国革命的错误。

1922年4月，马林回莫斯科前，曾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了与孙中山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但遭到了拒绝。这时，青年团共产代表达林到达上海，准备去广州，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上海后，苏俄政府使团长发给他代表苏俄政府证书。4月29日，他以苏俄全权代表的身份同孙中山举行会谈，接着又进行了多次会谈。达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的形势，提出了国共两党实行合作的建议。孙中山表示愿意同苏俄建立联系加强友好感情，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但不同意实行国共两党平行的党外合作。这时，共产党人根本反对国共合作的意见也不多了，但大多数反对加入国民党，而只同意建立党外联合。

1922年7月马林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工作情况，并递交了《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局批准了马林关于中国情况和国共合作问题的报告，以及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形式的建议。7月1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中央，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和在马林紧密联系下进行。并于8月发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指出：“根据马林的报告，代表的所有活动必须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决议为基础”；“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共产党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的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8月，马林又陪同苏俄副外长越飞来华。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杭州西湖召开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会议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同意接受共产国际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至此，以实行国共两党党内合作形式落实了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决议。

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大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团结广大群众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方针问题和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策略问题提纲》和《东方问题提纲》。《东方问题提纲》规定了共产党人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应遵循的一系列重要原则，成为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的重要文献。提纲认为，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共产党面前的双重任务是：一方面，“它们要力争最彻底地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以求得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另一方面，“它又要利用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阵营内的种种矛盾，把工人和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特殊阶级利益而斗争。”^②大会决议贯彻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对制定共产党人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战略和策略做出了新的重要贡献。这对于中国第一次国

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了使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东方问题提纲》更好地适应中国情况,共产国际于1923年1月12日正式作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其主要内容:(1)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它既依靠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2)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3)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保持独特的政治面貌。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4)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⑤这个决议对清除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共产国际决议中过高估计国民党力量,过低的估计中国工人阶级力量,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是不符合中国情况的,忽略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坚持领导权思想,将无产阶级降到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地位,也是错误的。

上述两个决议,标志着共产国际采纳了马林的建议,决定联合孙中山实现国共党内合作策略的最终形成。

1923年1月18日,越飞从北京飞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双方经过多次会谈,于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双方就中俄联合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苏俄愿意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特权等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明确了平等友好的中俄关系。《宣言》发表后,廖仲恺受孙中山委派,陪同越飞到日本的热海,就实现宣言原则细节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讨论,使《宣言》原则实现更加具体化。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表明了孙中山放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孙中山联合苏俄政策确立,必然促进联共政策新发展,加速国共合作步伐。

1923年2月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事件,对中国共产党有关国共合作从“党外联合”向“党内联合”转变起了很大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加快了同国民党合作的步伐。1923年上半年,国共关系、共产国际同国民党的关系、苏联同孙中山的关系都得到了较快发展,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时机已经成熟。但是,中国共产党内大多数同志对“党内合作”的方式还存有疑虑。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共产国际执委1923年1月决议,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解决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大会依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

地问题理论,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立场,也正确估计了将国民党改造成四个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批评了当时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经过认真讨论,大会通过了《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明确了国共两党实现党内合作政策,统一了全党思想,使国共合作步入实施阶段。

中共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对党、团员广泛进行思想教育,消除加入国民党的疑虑。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团员加入国民党,青年团仍应保持严密组织,并同中国共产党的言论、行动保持一致。1923年10月,共产国际派鲍罗廷到广州接替马林的工作。鲍罗廷向孙中山转达了莫斯科领导人及加拉罕对孙中山的敬意,说明来广州的目的,并询问了广州情况。他还多次出席各种集会发表演说,宣传苏维埃政治制度和成就,鼓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特别强调系统宣传、群众教育和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还积极向孙中山建议加速国民党改组工作。他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参加指导国民党改组工作。10月25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9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鲍罗廷为顾问,全面负责国民党改组的各项准备工作。同一天,鲍罗廷在国民党党员骨干会议上作了报告,阐述了建立强大的、组织健全的党,对完成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此时鲍罗廷还向共产党建议,将中共粤区党团组成国民运动委员会,统一组织与领导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共产国际代表的积极工作,坚定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信心,加快了国民党改组的步伐。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获得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帮助,集中于建立革命武装和进行革命战争,以便引导国民党投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从侧面支持苏联的革命事业。为此,共产国际和苏联派出大批顾问到中国,帮助孙中山开办军事学校,制定作战计划、改革军事制度、传授军事知识、训练革命军队。1923年10月15日,国民党党务会议讨论通过一项建立“陆军讲武堂”的提案,后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国民军军官学校”,拟定孙中山任校长,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负责筹备开办。1924年1月,鲍罗廷派捷列沙托夫、捷尔曼等组成第一个顾问小组,参加黄埔军校筹建工作。4月16日,鲍罗廷和加拉罕应孙中山要求电请莫斯科“(1)选派50名工作积极的军事人员组成顾问团来广州;(2)应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能使孙中山敬服的同志率领这个顾问团。”^①5月5日,黄埔军官学校正式成立。由于国共密切合作和苏联顾问人员在多方面指导与帮助,黄埔军校发展很快,不久就成为体制健全、组织严密、规模较大的军事学校。该校聘请鲍罗廷、加伦等十几位苏联军官任顾问和教官。军校采取军事、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针,军事教育中采取当时苏联最新的军

事理论和技术。除对学生认真教导和严格训练外,还在学员和军队中实行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加强学员和军队政治素质。

北伐战争中,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军事顾问随军北伐。为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为中国革命形势顺利发展起了积极作用。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胜利进军,各地工农运动蓬勃发展。11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阐述了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性质;提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将日渐落在无产阶级身上”,并要警惕“帝国主义者,企图叫醒民族资产阶级,使之脱离革命战线。”“中国共产党决定要用全力去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革命的前途”。强调“土地问题开始紧急起来,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那个阶级能够毅然攫住这个问题而给以彻底的答复,这个阶级就是革命的领袖”。“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它的性质及其前途,均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并加紧在其中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使国民党发展成为真正平民的政党——包含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经济人的被压迫者之坚实的革命联盟”。“共产党应当加入广东政府,以帮助左派反对右派之懦弱而动摇的政策”。这些意见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中国共产党执行这些意见和以此制定政策,会有利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发展,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许多地方国民党右派和地方军阀纷纷扯起反共旗帜,打着“欢送共产党人出境”的旗号,押解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出境,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处于紧急关头。共产国际于1927年5月18—30日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斯大林在会上发表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专题演说。共产国际根据斯大林演说,通过了《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同时,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发来两次紧急指示(“五月指示信”),其要点:(1)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革命。这是“革命和国民党成功的基础”,“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可怜的玩物。”(2)改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3)武装党员和工农群众,重新组建革命军队。“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5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4)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组织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与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⑤

共产国际指示信,强调立即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和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克服中国革命困难局面,原则是对的,但也有原则性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

关于土地革命问题,既主张自下而上发展,又不能超出武汉国民政府允许的范围,这是难于实现的。第二,关于建立革命武装问题,共产国际和苏联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来一直帮助培养军事干部、建立革命武装,但没有自觉地帮助共产党掌握革命武装,此时提已为时太晚。第三,关于改组国民党中央问题,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未能自始注意帮助共产党掌握领导权,此时共产党是无能为力改组国民党中央的。第四,关于建立革命法庭问题,共产党无军权、无党权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建立革命法庭的“五月指示信”体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问题认识的进步,态度是积极的,但为时已晚,许多严重局面已经形成,无法挽回。同时,共产国际要求继续维持国共合作的前提下执行其“指示”,以及依靠武汉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清除国民革命军中的反动军官,都是行不通的。因为汪精卫和武汉国民党中央中一些要人反动倾向十分明显,已经不能代表革命势力。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不仅未能按“指示”精神,结合中国政治形势,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组织革命力量,开展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而且扣押和封锁这个文件,不在领导干部中传达,不让广大共产党员知道,实际是拒绝执行共产国际指示。

综上所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实现的,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共产国际成立不久就派出代表来华工作,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十月革命经验,使中国先进分子有了新的革命觉悟。孙中山在绝望中找到了苏联这支国际上的新生力量,开始了他一生中的伟大转变。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就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以及联合战线等问题有新的认识,并产生了新的策略。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来华代表的工作,使国共合作的可能变成了现实,体现了共产国际支援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职责。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受帝国主义国家封锁和威胁,国内又有资产阶级和富农阶级的捣乱,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得不放弃,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也迫切需要国际同情和被压迫人民的支持。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自然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不会忘记的。因此,共产国际和苏联支援中国共产党实现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帮助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组,推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既是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援助,使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对苏联的有力支援。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共产国际对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指导意见和建议基本是正确的。在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共同开创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局面,有力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但是,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问题指示也有错误。如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就存在着对工人阶级力量估计不足,轻视共产党,重视国民党的问题,称“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现实工人阶级又尚未充分分化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国民党是现实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